



# 二十世纪的历史学

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

Historiograph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From Scientific Objectivity  
to the Postmodern  
Challenge

山东大学出版社

[美]格奥尔格·伊格尔斯 著  
何兆武 译

主编  
陈启能

人文  
前沿书  
人前丛

人文  
前沿书  
人前丛

主编  
陈启能

主编  
王学令  
副主编  
孔姜

# 二十世纪的历史学

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

Historiograph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From Scientific Objectivity  
to the Postmodern  
Challenge

[美] 格奥尔格·伊格尔斯 著  
何兆武 译

山东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美)伊格尔斯著;  
何兆武译. —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1

(人文前沿丛书/陈启能主编)

ISBN 7-5607-3056-6

I. 二... II. ①伊... ②何... III. 史学-研究-20世纪 IV. K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92915 号

**Georg G. Iggers**

***Historiograph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From Scientific Objectivity to the Postmodern Challenge***

**Nanover, NH,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97**

此次中文版的出版承蒙辽宁教育出版社的同意。

新版后记的出版由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授权。

**New Epilogue to *Historiograph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From Scientific Objectivity to the Postmodern Challenge.***

**Epilogue © 2005 by Georg G. Iggers. Reprinted with the**

**Permission of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

出版发行: 山东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7 号(250100)

经 销: 山东省新华书店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规 格: 720×980 毫米(1/16)

印 张: 14.25

字 数: 256 千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营销部负责调换

# 人文前沿丛书

## The Frontiers of Humanities

主 编 陈启能

副主编 王学典 孔令栋 姜 芃

顾 问 (以姓氏的英文字母为序)

Carlos Antonio Aguirre Rojas

卡洛斯·安东尼奥·阿吉雷·罗哈斯,墨西哥

Jerry Bentley

杰里·本特莱,美国

Peter Burke

彼得·伯克,英国

Charles Burton

查尔斯·伯顿,加拿大

Alexander Oganovich Chubarian

亚历山大·奥加诺维奇·丘巴里扬,俄国

Brian L. Evans

布赖恩·埃文斯,加拿大

Usha George

乌莎·乔治,加拿大

Carlo Ginzberg

卡罗·金兹伯格,意大利

Yvonne Herbert

伊万尼·赫伯特,加拿大

Dirk Hoerder

狄克·霍德尔, 德国

Georg G. Iggers

格奥尔格·G·伊格尔斯, 美国

Juergen Kocka

于尔根·科卡, 德国

Chris Lorenz

克里斯·洛伦兹, 荷兰

Boris Nikolaevich Mironov

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米罗诺夫, 俄国

Lorina Petrovna Repina

洛里娜·彼得罗芙娜·列宾娜, 俄国

Joern Ruesen

约恩·吕森, 德国

Richard Vann

理查德·范恩, 美国

Immanuel Wallerstein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美国

Q. Edward Wang

王晴佳, 美国

Hayden White

海登·怀特, 美国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守和	于 沛	王 曷	朱政惠	齐 涛	刘家	和
李幼蒸	何 平	何兆武	陈 炎	陈 恒	陈筠泉	
周春生	赵轶峰	郝名玮	倪培耕	曹特金	傅有德	

## 中译本增订版前言

伊格尔斯(Georg G. Iggers)所著《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的德文版(*Geschichtswissenschaft im 20 Jahrhundert. Ein kritischer Überblick in internationalen Vergleich*)于1993年由德国哥廷根的Vandenhoeck & Ruprecht in Göttingen出版社出版。它的英文版于1997年由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出版。它的中译本由译者译出,于2003年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2004年,原作者又为本书补写了一篇后记——《21世纪初的回顾》,作为对本书的补充说明。2005年,本书的英文新版连同这篇后记(*Historiograph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From Scientific Objectivity to the Postmodern Challenge with a new eplilogue*)由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出版。

这次的中译本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译本对上一版的译文进行了详细校订和修正。上一版的附录——伊格尔斯的论文《美国与德国历史思想中的兰克形象》仍收入其中。这次修订出版的过程中,承友人陈启能先生、张丽艳女士的大力协助,谨此致谢。

译者

2004年秋于北京清华园

## 译者前言

本书作者格奥尔格·G·伊格尔斯(Georg G. Iggers, 1926~ )是当今美国著名的思想史家和史学史家,原籍德国,1951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曾长期在芝加哥大学任教,1978年起任纽约大学布法罗分校欧洲思想史荣誉教授至今。半个世纪以来,他曾有专著多种和论文多篇问世,且有不少已译为中文。1962年中文即已译有他的《美国与德国历史学中的兰克形象》一文(载《历史译丛》,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期)。1989年他的《欧洲史学新方向》(赵世玲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和他的《历史研究国际手册:当代史学研究和理论》(陈海宏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两书中译本出版。另外,他的《德国的史学观——从赫德尔到当今史学思想史中的民族传统》虽尚未见中译本,但已在西方史学界享誉颇隆。

1993年伊格尔斯曾以德文写了《二十世纪的历史科学——国际背景评述》一书,在德国哥廷根出版,经张芝联先生推荐,已译为中文出版(《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1~2期、1996年第1~2期连载)。1997年他又用英文写了一部《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由美国威斯理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自序此书说:“这个英文本并不是德文本的译文,在许多方面它都是另一部著作,是过去三年之中我对德文本进行补充、阅读和讨论以及保持批判的距离所获得的结论。”

去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陈启能兄邀我和他共同逐译此书,以供我国史学界同人的阅读和参考。在我动笔之后,陈启能兄以工作繁忙不克分身,遂将全书译事委诸我一人承乏。现值全书译竣之际,我要感谢他对本书翻译从始至终的关注和帮助以及与出版社的联系。原作者的前一部书《二十世纪的历史科学——国际背景评述》也是由陈启能兄全权进行组织工作的,我所承担的

只是具体业务工作。

原书中所引的参考文献甚多,有一些未能找到原文,只好就字面加以理解;如有错误,尚乞读者加以指正,拜嘉无极。

译者谨识

1999年春于北京清华园

又:兰克在近代西方史学史上的地位似可方之于牛顿在近代西方科学史上的地位;到了20世纪两人绝对权威的地位均告动摇。20世纪二三十年代傅斯年主持建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路数,其意即在师兰克的故智。当时胡适、傅斯年一辈人都认为历史学就是史料考据,故有“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格言。殊不知证据本身是不会说话的;说话的不是证据,而是号称掌握了证据的人。而且“史料即史学”的说法,也是对兰克及其学派的严重误解。兰克及其学派虽然以资料博洽、考据精赅著称,然而他们进行研究的指导思想却是他们内心深处那种根深蒂固的世界观。不首先深入考察指导他们思想的世界观,则对兰克及其学派的理解仍不免是雾里看花,终隔一层。为了理解20世纪史学思想的19世纪背景,现将同一作者的《美国和德国历史思想中的兰克形象》一文附录于书后,以供关心现代西方史学的读者们参考。

译者附识



## 中文版序言

我非常高兴，本书在人民共和国即将以中文出版。中国对我的著作感兴趣，我也深感荣幸。我最初的文章之一《美国和德国思想中的兰克形象》在1962年就已经有了中文译文，后来我得知它的翻译者就是本书的翻译者何兆武先生。后来我的《欧洲史学的新方向》(1975)和我与哈罗德·T·派克合编的《历史研究国际手册》(1979)两书，均于1989年在北京出版。多年来我和北京大学张芝联教授有着密切的学术接触。自从1980年“历史学的历史与理论”国际委员会创建以来，他一直是该会一个活跃的成员，也曾是我在布法罗城的客人。齐世荣教授在1982年有6个月作为我系布法罗城的访问教授，也是我的同事。反过来，我的妻子和我在1984年也有六个半星期在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做他的客人；当时我还在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南京大学作过讲演。我在布法罗城有过几个中国学生；王晴佳成了我的好友，我和他在有关比较历史学的题目上一直密切合作；邵立新来自北京，他为我写过一篇关于中国接受尼采的论文；还有周桂楷来自台中，他写过美国劳工历史学。我对于中国历史学家的著作日愈感到兴趣，无论是古典的还是当代的，尽管不幸的是我不能阅读中文而必须依靠翻译。过去五年内，我积极参与了一项《中国文学与比较史学》的国际项目，我期待着在2001年夏季再次访问中国，届时我希望能讨论此书的题材，并且也能学习到我所考察的当代欧洲和北美的历史学思想和著作是曾经怎样引用于中国的问题的。

本书所探讨的关键问题是后现代主义向严谨的历史学所提出的挑战。本书是1990年我在费城关于《合理性与历史》这个题目所作的一次讲话的扩充。另外两位小组讨论发言人迈克尔·穆莱(Michael Murray)和列泽克·柯拉可夫斯基(Lsszek Kolakowski)都认为从事合理性的探讨以及客观性，乃是属于已告结束的那个近代时期的一种幻觉。穆莱从一种海德格尔式的立场出发，宣称启蒙

运动的事业及其对于某一种主义的真实性的信念——它是可以被理解的，并且在某种限度之内是被人类的智慧所塑造的，是为人间的和人道的目的而服务的——已经破产了。柯拉可夫斯基在波兰开始他的思想工作时，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者，也抱有这种幻灭感；但是他力图以回归到宗教性——它先行于并且继续着自从希腊的古代以来就塑造了西方思想的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来对一个已经丧失了一切幻念的时代重新建立起稳定性和意义。我在我的讲话里是维护一种经过了提炼的启蒙运动的。我承认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提奥多·阿多尔诺(Theodor Adorno)所称之为的“启蒙运动的辩证法”，那在企图克服神话和野蛮主义时，却培养出了新的神话和一种在科学上十分完美的野蛮主义。然而同时我也在维护着为一个适宜于生活的文明世界所必需的那种人道与理性的因素。

这本小书是我在费城所作的那次讲话中的思想的发挥，要考察的是近来各种讨论是曾经怎样地在实际上影响了实践的历史学家们的工作，因而本书就取代了我早先在《欧洲史学的新方向》一书中对20世纪史学思想和著作的论述，而不只是对前书的修订和补充。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在历史研究中发生了很多事情。前书对于近代历史学的讨论截止于20世纪70年代的初期，当时对于历史学作为基于经验的与分析的社会科学之上的一门高度技术化的学术的可能性，有着很大的信心。“年鉴派”历史学家们、计量历史学家们和马克思主义者都沿着同一个方向在行动，尽管他们的社会政治观点不同。他们大家都以自己已经克服了自从兰克以来历史学家们把叙事的焦点集中在左右了历史学的伟大事件、人物和思想上的那种狭隘的局限性而感到自豪。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问题变得日愈明显和自从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社会所依靠的那些乐观的假设受到了挑战，他们对科学、进步和现代性的信仰从20世纪的60年代以后已经极大地动摇了。所有这一切都表现在历史编纂学的方法上，它从精英们的身上转移到居民中的其他部分，从巨大的非个人的结构转移到日常生活的各种现实的方面，从宏观历史转移到微观历史，从社会史转移到文化史。对冲突的看法也不相同了，这些看法从一种更为非个人的层次出发，而不再仅限于以前的兰克的势力均衡或马克思的阶级冲突那种宏伟的概念了。性关系与性能力，成为了历史生活中的重要内容。所有这些都包含着新的研究战略，它更少依赖于传统的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科学，而更多依赖于人类学、语言学和符号学。因此本书就必须从以前

那部书已告中止的地方入手。但是对新趋势的考察,也需要格外关注并批判晚近的历史学所依赖的理论前提。比起一部概述来,本书更像是一篇展开了的论文,它比前一部书更加有意识地提出了一种对后现代主义的立场易于接受的而同时又是批判的观点。后现代的思想家们,从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到海登·怀特(Hayden White)、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和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对于科学合理性的界限及高度评价科学与合理性的地方文明的性质,都曾提出过许多重要的问题。历史学家在过去的三十年之中已经探索了新的地带和新的战略;他们已经改变了过去那种要献身于严谨的研究,如实地重建历史的初衷。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其意义并不在于历史学的研究而在于更加精深的论辩。

本书的最初德文本 *Geschichtswissenschaft im 20 Jahrhundert* (《20 世纪的历史学》) 于 1993 年出版,中文翻译为一系列的论文刊登于《史学理论研究》上。目前这部书出版于四年以后;它不是德文本的译本,而是重新改写过并增补过的。

最后,我谨表示我对张芝联教授、王晴佳教授、陈启能教授和译者何兆武先生使得本书能呈于中国读者面前的特别感谢之忱。

格奥尔格·G·伊格尔斯  
美国纽约州布法罗城

1999 年 11 月

## 序言与致谢

本书的德文本出版于1993年,同时已被译为中文<sup>①</sup>、日文和西班牙文。德文本是以1990年4月我在“费城哲学讨论会”(Philadelphia Philosophy Consortium)上所发表的论《合理性与历史》一文为基础的,文中探讨了后现代主义对历史研究挑战的问题。目前的这个英文本并不是德文本的译文,在许多方面都是另一部著作,它是过去三年间我对德文本加以补充、阅读和讨论以及保持批判的距离所获得的结论。

有两点声明:尽管本书试图要对国际范围上的历史思想作一番比较考察,但它只限于我所能阅读的语种。因此焦点就聚在大不列颠和北美、法国和比利时、德语中欧和意大利,偶尔也提到波兰和俄国著作的译本。然而哪怕就在这些地区,我挑出来的作者们也必定是有高度选择性的,焦点主要是集中在那些可以阐明历史学研究重要趋势的历史学家们身上。

我要感激过去六年中间那些允许我得以检验我的论点并对较早的原稿本进行过评论的学生们和同事们。我特别感谢莱比锡大学我的讨论班上的成员们,他们在1992年夏季我任客座教授的学期中,阅读并评论过德文手稿的初稿;感谢在大西洋两岸和日本的许多同事和朋友们,他们也阅读了手稿并提出了批评性的建议,其中包括 Werner Berthold, Gerald Diesener, Christoph Dipper, Wolfgang Ernst, Dagmar Friedrich, Akira Hayashima, Wolfgang Hardtwig, Frank Klaas, Wolfgang Küttler, Jonathan Knudsen, Iris Pilling, Lutz Raphael, Anne-Katrin Richter, Hans Schleier, Ulrich Schneckener, Fernando Sánchez Warcos, Christian Simon, B. Sträth, Rudolf von Thaddeu, Wiebke von Thad-

---

<sup>①</sup> 中译文《二十世纪的历史科学》连载于《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1、2、3、4期,1996年第1、2期。——译者注

den, Edoardo Tortarolo, Johan van der Zande 和 Peter Waltner。我要感谢 Otavia Niccoli 有关晚近意大利社会文化史的有用的提示。我发现哥廷根的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历史研究所是一个惬意的和富于启发性的地方,可以让我写出大部分的德文稿和英文稿。在这个研究所,我不但能够使用一座藏书丰富的图书馆,而且还有机会和阅读过本书全部或大部分的学者们讨论本书,其中包括 Hans-Erich Bödeker, Alf Lüdtke, Otto Geshard Oexle, Jürgen Schlumbohm 和 Rudolf Vierhaus 在内。Jörn Rüsen 邀请我出席过的“贝勒费尔德(Bielefeld)跨学科研究中心”的许多次讨论会,它们都是非常有价值的。在德国方面, Uandenhoeck & Ruprecht 出版社的 Winfried Hellmann 是一位出色的编辑,他在德文本出版之前和我反复晤谈并提出了犀利的批评。我非常感谢柏克(Peter Burke),他在一段短文里读到了英文手稿并提出了很有价值的建议,我已经采用了;我也感谢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的 Albert Cremer 和 Stephen Kaudelka 以及 Mission Historique Française en Allemagne(法国史学访德代表团)的 Patrice Veit,他们阅读了英文本的《年鉴派》一章。我还要感谢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的 Karl Sieuerling 在计算机方面给予的协助、州立大学 Lockwood 图书馆的 Charles Daniello 在目录学方面提供的帮助以及我在布法罗(Buffalo)的助手 Song-ho Ha 向我提供的出色的文秘与学术方面的帮助。此外,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应允安排我的教学计划,使我有最大限度的时间从事我的研究和写作;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中心为本书提供了资助;洪堡基金(Humboldt Foundation)为我提供了两次在德国的半年生活费。他们的帮助,使本书的写作得以顺利进行,谨致谢忱。我还特别要感谢我的妻子 Wilma,她细心地查对了德文和英文两种文本在体裁和逻辑上的一贯性,并作出过一份英译的草稿。

格·G·伊格尔斯  
1996年5月于哥廷根

# 目 录

中译本增订版前言	(1)
译者前言	(1)
中文版序言	(1)
序言与致谢	(1)

绪论	(1)
----	-----

## I. 早期阶段:历史学作为一种专业规范的诞生

第一章 作为历史学研究典型的古典历史主义	(25)
第二章 古典历史主义的危机	(34)
第三章 德国的经济社会史与历史社会学的滥觞	(40)
第四章 社会史学的美国传统	(45)

## II. 中期阶段:社会科学的挑战

第五章 法国:年鉴派	(53)
第六章 批判理论与社会史:联邦德国的“历史社会科学”	(69)
第七章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从历史唯物主义到批判的人类学	(82)

## III. 历史学与后现代主义的挑战

第八章 劳伦斯·斯通与“叙述史学的复兴”	(101)
第九章 从宏观史学到微观史学:日常生活史	(105)
第十章 “转向语言学”:历史学之作为一种学术的终结?	(123)
第十一章 20世纪90年代的视角	(140)

结束语·····	(147)
附录 美国与德国历史思想中的兰克形象·····	(154)
推荐阅读书目·····	(182)
中外专有名词对照·····	(184)
后记 21 世纪初的回顾 ·····	(199)

## 绪 论

二十多年前我出版了一本有关当时欧洲历史学研究状况的小册子,书中我说明了学术研究的传统形式是怎样地被更新颖的历史研究形式所取而代之的<sup>①</sup>。所有国家的历史学家们大抵都同意,自从19世纪初期国际上就开始作为一种专业规范在运用着的那种历史研究方式,已经是既不符合20世纪下半叶的社会政治状况,也不符合现代科学的要求了。同时,有关历史的和历史学的观念,也经历了深刻的变化。因此,本书不应该被看作一部续编,即要把我1975年的著作写到今天,反之,它主要地是涉及从当今历史学家们思想中和实践中所挑选出来的某些基本变化。尽管有许多旧式的历史研究和历史写作的形式还在继续着,然而已经发生了一场基本性的重新定向。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19世纪以来以历史学作为一种专门学术的出场为其基础的那种历史学的研究与写作的种种假设,就日愈受到了人们的质疑。有许多这类假设都要追溯到西方历史学从古典古代一直延续下来的那个传统的开端。19世纪的新事物则是历史研究的专业化及其集中到大学里和研究中心。而成其为专业化的核心的,则是对历史学的科学地位的坚定信念。历史学家所理解的“科学”这一概念,肯定地是与自然科学家所理解的大不相同,自然科学家追求的乃是概括化与抽象定律形式的知识。对历史学家们而言,历史不同于自然,因为历史学处理的乃是表现为创造了历史的男男女女们的意愿以及使社会得以凝聚的种种价值和风尚。历史学处理的是处在时间之中的具体的人和具体的文化。然而历史学家们一般地也都在分享各种专业化科学的那种乐观主义,亦即受控的研究在方法论上就使得客观的知识成为了可能。对于历史学家们也像对其他科学家们一样:真理就在于知识与客观实际相符合;那对于历史学家而言便是“要像它实际上所发生的那样”<sup>②</sup>建构过去。历史学这一自我界定如成为一种科学规范,对于历史学家的工作就蕴涵着科学话语与文艺话语、专业历史学



家与业余爱好者双方之间的严格区分。历史学家们忽视了事先就在决定着他们研究结果的那些有关历史行程与社会结构的各种假设。

然而,历史学之转化为一种制度化了的规范,却绝不可引导我们忽视古老的历史写作形式的连续性。19世纪的历史学是处于要上溯到古希腊伟大历史学家们的那种传统之中的。他们和修昔底德一起分享着对于神话与真实的分野,同时尽管他们强调历史著作之科学的因而是非修辞学的特性,但却循着历史写作的古典传统在前进着,在设想历史总是作为一种叙述而被写下来的。然而正如海登·怀特(Hayden White)<sup>③</sup>和最近其他一些史学理论家已经指出的,历史叙述的问题就在于:虽说它是由经验所认定的事实或事件出发的,它却必然地需要有想象的步骤来把它们置于一个完整一贯的故事之中。因此,虚构的成分就进入到一切历史的话语之中。

因此,19世纪“科学的”的历史学和古老的历史学的文艺传统之间的断裂,一点也不像许多19世纪的历史学家们所设想的那样大。“科学的”历史学话语就包含有文学的想象在内,而古老的文学传统也是在重建真实的过去之中寻找真理的。自从利奥波尔德·冯·兰克以来,“科学的”取向就和从修昔底德到吉朋的文学传统共同享有三项基本的前提:(1)他们都接受了真理的符合论(Correspondance Theory of Truth),认为历史学是描绘确实存在过的人和确实发生过的事;(2)他们都假设人的行为反映了行为者的意图,而历史学家的任务则是要理解这些意图以便重建一篇完整一贯的历史故事;(3)他们是按照一种一维的(one-dimensional)、历时的(diachronical)的时间观念在运作的,其中后来的事件是在一个完整一贯的序列之中随着较早的事件相续而来的。这些有关真实性、意图性和时间序列的前提,就决定了从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到兰克,以及从兰克一直到20世纪的历史著作的结构。而正是这些前提,在最近的史学思想中却逐渐地受到了质疑。

我相信我们可以在20世纪的史学思想中区别两种十分不同的取向。第一种是探讨由19世纪的专业历史学所特有的那种叙事的、朝着事件定向的历史学之转化为20世纪朝着社会科学定向的历史研究与写作的形式。传统历史学的基本前提受到了挑战,但是上述的根本前提却始终未被触及。各式各样社会科学取向的历史学,织就了从定量的社会学与经济学研究方法和年鉴学派的结构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那样一道方法论的和意识形态的光谱。所有这些